



中国的思想与社会

——历史研究的回顾、探索与展望

上海大学历史系 陶飞亚 编
中国留美历史学会 姚平

上海大学出版社



陶飞亚 主编

中国的思想与社会

——历史研究的回顾、探索与展望

上海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的思想与社会：历史研究的回顾、探索与展望
/上海大学历史系陶飞亚、中国留美历史学会姚平编。

—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10.9

ISBN 978-7-81118-653-6

I. ①中… II. ①陶… III. ①中国—历史—学术会议—文集 IV. ①K2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38736 号

本研究得到上海市教育委员会重点学科(第五期)
“近现代中国社会文化史”(J50106)的资助。

中国的思想与社会

——历史研究的回顾、探索与展望

上海大学历史系 陶飞亚

编

中国留美历史学会 姚平

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上大路 99 号 邮政编码 200444)

(<http://www.shangdapress.com> 发行热线 66135110)

出版人：姚铁军

*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排版

上海叶大印务发展有限公司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960 1/16 印张 30 字数 475 千

2010 年 9 月第 1 版 201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 100

ISBN 978-7-81118-653-6/K·079 定价：70.00 元

目录 Contents

导言 / 1

主题演讲

姜义华：近三十年中国史学发展

——从帝王之学到普遍性的人学 / 18

萧知纬：早期中国电影在美国放映的历史初探 / 28

高 峥：消费主义

——美国历史研究的新范式及其对中国研究的启示 / 40

徐善伟：当代西方新史学与“史料之革命”

——兼论对中国史学之史料体系重构的启示 / 52

高艳丽：意识形态与美国对华政策

——以周以德之中国观为案例的研究 / 62

邵 雍：《纽约时报》视野下的唐人街 / 83

张勇安：业界利益与公共福利的双赢：美国医学会与药品管理的
联邦化(1891—1912) / 90

王 希：在美国创办学术期刊

——关于 CHR 成长经历的回顾 / 122

魏楚雄：对历史公正性与客观性的挑战：南京大屠杀研究与
历史的政治化及去政治化 / 153

罗 珍：史学与社会

- 以 20 世纪上半叶中国近代史研究为考察对象 / 196
- 许纪霖：大我的消解
——唯我式个人主义如何在中国兴起 / 214
- 陈 勇：钱穆与胡适 / 242
- 姚 平：大德之争：金仙、玉真公主受法及唐代公主的政治历程 / 272
- 谢贵安：试论儒学与史学的关系
——以儒学对实录体史书编纂的影响为例 / 287
- 张童心 荣 亮：“西学东渐”与中国近代考古学 / 303
- 杨 莉：唐代女道士的经济生活类型
——以《墉城集仙录》为主的考察 / 316
- 孙 绮：历史的变迁与延续：试论中国农村女性的权利贫困 / 329
- 张 泓：现代化与中国城市女性的自我表征 / 342
- 王先明：乡绅权势消退的历史轨迹
——20 世纪前期的制度变迁、革命话语与乡绅权力 / 356
- 李国彤：“天下无不可教之人”：明清女教书探析 / 381
- 刘长林：媒体对自杀社会意义的赋予
——以中国 1919—1928 年社会运动为例 / 399
- 严 泉：选举舞弊与民主转型：以民初第一届国会选举为个案 / 427
- 倪 亭：妇女还能顶半边天吗：从保护女工法案看经济改革对
城市女性的影响 / 441
- 张家炎：中国经济的发展与对中国经济史的重新认识 / 448
- 陈锦骅：伊罗生与中国革命 / 463
- 致谢 / 474

导 言

历史学家的使命

不止一次地听到史学界中人说,近年来的中国史学研究已经很少有过去那种吸引许多史家共同参与的所谓热点问题。如果这基本属实,原因在哪里?在上海大学历史系与中国留美历史学会联合召开的“历史研究的回顾、探索、展望”的国际学术会议上,上海历史学会会长、复旦大学教授姜义华的主题发言《当代中国史学:从帝王之学到普遍性的人学》正好针对了这个问题。他概括了近三十年中国史学的发展过程、理论趋向及存在的问题,认为近三十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史学革命,完成了由关于帝王将相的学问向普遍性人学的转变。第一,把传统历史学关注的帝王将相逐渐从神坛拉了下来,还原为真正意义上的人,并把一些妖魔化的人物还原其本来面目。第二,把自身关注的重点从原来为帝王统治服务到为巩固无产阶级政权服务,转向认识人类自身的历史。第三,把研究的重点更多地放在了人的思维性上。在回顾近三十年来史学发展中存在的主要思想分歧的同时,姜先生的结论是:随着资讯化时代的到来,历史已经迈出了一两个人主宰的时期,普通百姓作为社会主体的时代已经开启,史学作为研究普遍性的人性之学,它的未来是光明的。不论我们是否完全认同他的看法,所谓史学研究热点散乱,或许正是印证了他所说的史学的转变和重心的下移。

本次会议的名称也有一点适应这种转变的意思。大会会议上宣读的论文有35篇,涉及的内容相当广泛。为了方便讨论,尽量把一些相近的内容归类,大致分为中国史研究的理论范式、美国与中国、中国史研究的回顾与反思、国际体系下的中国、近代思想与人物、宗教与历史、学术中的史学、女性与中国历史、社会史视野下的近代中国、民主与政治认同、经济史中的中国、共产主义与中国等十二节会议。我们先介绍一下当日会议的论文宣读和讨论的实况,再来看看这些论文蕴涵的意味和启示。

一、会议实录

1. 中国史研究的理论范式

美国乔治亚理工学院卢汉超的《中国何时开始落后于西方？——论西方汉学中的“唱盛中国”流派》，论述了近年西方史学界出现的赞美中国的潮流。作者分析了彭慕兰、艾尔曼、何伟亚、罗威廉等人的著述，简要概括了这些论述的主要观点，描述了它们所引起的学术争议，探索其对中国史学研究的启迪作用。

加州州立大学圣马克斯分校萧知纬的《历史的回顾：美国电影业对中国形象的塑造》另辟新径，以 20 世纪上半叶美国电影中的中国形象为研究视角，结合电影的社会影响力，探讨了美国电影在塑造国内民众心目中的中国形象的作用。萧认为美国电影为了迎合美国资产阶级政党反华排华的需要，恶意丑化旅美华人的形象，这违反了新闻机构客观、公正、透明的职业要求。

美国马里兰大学高崢的《消费主义：美国历史学的新范式及对中国历史研究的启示》描述了消费主义在美国产生的历史背景及在美国民众社会生活中的影响，透析了美国历史学界在此中发现的历史学研究的新范式，并从该范式的选题角度、现实作用，探析了消费主义在中美历史研究中的价值。

上海大学徐善伟的《当代西方新史学与“史料之革命”——兼论对中国史学之史料体系重构的启示》比较研究了西方新、旧史学在史料观上的特点和价值，探讨了西方新史学“史料革命”的原因、内涵和意义。该文从史学观念的更新、研究领域的拓展、跨学科研究的运用等角度阐述了西方新史学“史料革命”发生的原因。徐认为西方新史学不仅强调历史资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而且利用口述资料、文学艺术资料等手段扩大了历史研究选材的范围。同时，还直接推动了历史资料在存储、检索、传递和分析、考证方面所产生的重大变化。徐觉得中国史学界应当借鉴西方史学界的经验，更新史料观念，构建符合中国史学体系的史料体系。

卢汉超的文章引起了与会学者的浓厚兴趣。陶飞亚认为大陆同行关注到了这个有趣的问题，希望文章多一点关于“唱盛”中国的美国学者的家庭生

活背景、个人爱好和学术旨趣的介绍,对他们“唱盛”中国的动机有更深层次的探索。魏楚雄则认为虽然美国存在着“唱盛”中国的学者,但还是个人行为,没有形成流派,故不能拔高他们在树立美国民众积极健康的中国观上的作用。

2. 美国与中国

美国普渡大学洪朝辉的《民国史、国共关系史和中美关系史的新发现——熊式辉日记〈海桑集〉的史学价值》一文,从地方史、民国史和中美关系史的角度,阐述了该集的如下内容特点:其一,完整地记录了1931年至1941年江西社会的发展;其二,首次描述了熊式辉在1942年3月到1943年4月带领中华民国军事代表团出访美加和欧洲的具体过程;其三,记载了熊主政东北两年(1945年8月—1947年8月)期间诸多重要的活动。洪认为这将对江西地方史、东北地方史、太平洋战争时期中外各政治集团的利益纠葛、国民党军政要员的研究及美国军事史、科技史和二战军工史等研究领域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

北京大学高艳丽的《意识形态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以周以德为案例的研究》,论述了周以德的中国观和其影响美国对华政策的努力。周以德曾两次来华担任医务传教士,后在美国国会众议院任议员长达20年之久,在美国对华关系的一系列委员会中担任领导职务,可谓中美关系史上一位富有传奇式的人物。该文通过对周以德在中国的传教生涯、对中国社会和民众的认知、对中西文化的比较认识和对国共两党异同态度的描述,论述了基督教价值观对周以德的人生观和价值取向的影响,进一步探讨了他在华经历和价值意识对其中国观形成的作用。该文最后总结了周以德中国观的特点:其一,从在华传教经历而言,周以德可谓是一名自由派传教士;其二,对中国人民和文化,周以德在情感上是认同和热爱的;其三,由于政治意识形态的原因,周以德对国共两党的评价有失公允。

上海师范大学邵雍的《〈纽约时报〉视野下的唐人街》以《纽约时报》为分析对象,截取其刊载的唐人街的相关报道,梳理了报道背后的文化动机、变化痕迹及其动因,考察了《纽约时报》在塑造美国民众的中国观上所起到的作用。

上海大学张勇安的《业界利益与公共福利的双赢:美国医学会与药品管理的联邦化(1891—1912)》,考察了从1891年美国参议院讨论的第一件关于

中国的思想与社会：历史研究的回顾、探索与展望 一 ◎

食品和药品的综合议案到1912年《谢利修正案》的颁发这段时期内美国医学会和联邦政府对药品的管理。该文认为在这20余年中,美国医学会与联邦政府的互动合作优化了转型年代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该会在药品政策制定过程中所表现出的“政治—空间关系”实现了自身由边缘到中心的转变,从而借此实现了业界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双赢。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上海大学特聘教授汪朝光对洪朝晖的文章认为:史家应充分注意日记的主观性,特别要结合日记的记录者所处的历史时代背景和其自身的政治倾向及个人品性,谨慎地看待日记的史料价值。美国康奈尔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的双聘教授陈兼则对某些术语提出了质疑,认为文中一再出现的“披露”一词不符合文章内容,“披露”是指开发出原本并不存在的东西,而该日记则是熊式辉在其生前编辑的。洪朝晖在回应时对以上两位学者的观点表示认同,并补充说该日记主要是电报的汇编,故应当全面客观地看待它的史学价值。

高艳丽在回应与会者的问题时指出,影响周以德的中国观是受他的意识形态和美国国家利益所制约的,至于两个因素的轻重则随着时势的发展有所起伏,但总的来说,意识形态比国家利益更能决定他的思维和行动。

美国艾奇伍德学院陈锦骅在点评邵雍的文章时指出,以《纽约时报》为视窗考察美国民众对旅美华人态度的演变是值得推敲的。汪朝光则从方法论的角度认为该文的材料节选于郑曦原的著作,缺少全面的、一贯的审读,容易造成断章取义的感觉。有学者认为美国对华人的研究有着一个变化的过程,受政治、经济利益所牵制,其所反映的中国观也不全是消极的,反映的层次也是多向的。此外,还要结合美国媒体是否有批判自我的传统,这样才能理解《纽约时报》等美国媒介在批判中国时是出于民族意识还是媒体责任。有学者认为应当考虑美国对待西欧和北欧移民的态度,这样就会发现美国国内不仅仅排斥华人,所以不应当单纯地看待这个问题。邵雍表示在接下来的深入研究中除了吸收以上建议外,还将把美国的核心价值观和进步主义思潮纳入考察的视野。

3. 中国史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美国宾州印第安纳大学王希的《〈中国历史评论〉的回顾与展望》一文,剖析了中国留美历史学会所办的这份期刊的发展阶段和特点,并从经费筹划、

期刊品质、发行范围等方面规划了发展前景。该文将《中国历史评论》的发展过程划分为1987—1991年、1992—1997年和2003—2008年三个阶段,分析了其从办刊初期的比较多元的主题逐渐走向以中国史研究为主题的路向。

澳门大学魏楚雄的《历史的政治化与非政治化:南京大屠杀研究的过去与现在的趋势》一文,从抗日战争期间、抗日战争结束、冷战、越战、20世纪80年代、20年代90年代至今七个阶段,分析了当时学术界对南京大屠杀这一震惊中外的惨案的研究态度和视角。引人关注的是,作者结合中国对外关系及中国国内各种利益集团的博弈态势,分析了各个阶段不同研究群体对这一事件的看法所呈现出的微妙变化的原因,论证了政治因素对历史研究的影响和某种层面的“诱导”作用。魏认为研究者“应当遵守作为一名历史工作者所应有的职业操守和良心道德,专注于学术的公正性和声望,而不是某个政治集团或民众的意志;当自己的研究成果与新发现的史料有冲突时,应当毫不犹豫地重新评价或重订。只有坚持这些原则,在不久的将来,历史调查的框架才能在不同国家的学者中建立起来,南京大屠杀的历史真相才能逐渐还原”。

上海大学罗珍的《史学与社会——以20世纪上半叶中国近代史研究为考察对象》,根据相关研究资料梳理出1949年以前中国史学研究各领域的著作,认为“从传统史学转向对现实问题的具体思考,以及与现实密切相关的近代史研究”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史学发展的重要特点,进而结合梁启超、钱亦石、陈恭禄等人的著作分析了它们所反映的时代特色和研究视角,并认为这些著作所表现出的民族主义史学思潮“是当时中国社会思想和学术发展背景的反映,其所具有的特色是时代发展的综合成果”。

与会者对于王希的写作主题《中国历史评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多个角度提出了问题。陶飞亚对该刊物的定位、特点以及在旅美学者的文化认同方面的作用提出了问题;徐善伟则询问了美国学者对该刊物的帮助以及该刊物的发展走向。王希回应时详细阐述了该刊物在编辑制作、发行流通、经费支持等情况,谈到了该刊计划在中国国内同步发行的设想,并认为该刊物目前仍在复活阶段,建立自身的特色还有待时日。魏楚雄的文章则是另一个讨论热点。高崢认为在政治干预较强的前提下,个人记忆无法形成主流,从而导致诸多个体话语权的丧失,故应加强对南京大屠杀当事人的个案研究。徐

善伟认为应当研究政治气候是怎样影响民族主义倾向的,以及这种倾向对学术研究的影响。

4. 国际体系下的中国

陈兼的《冷战时代：国际体系和体制的演变——兼论中国在冷战中的地位和作用》认为,冷战并不是一般意义上对立双方围绕着国际权利分配而展开的争夺,而是双方关于各自制度孰优孰劣的竞争,从而引发了国际体系和体制的演变。结合中国当时的国情和国际形势,陈认为中国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战略平衡有着重要的影响,且由于自身的崛起对现存的国际秩序及其规范提出了全面挑战,这改变了冷战的走向,使得冷战双方实际交锋的焦点由欧洲逐步转向亚洲。陈的结论是:其一,冷战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意识形态因素在国际关系演变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其二,全球范围的冷战以苏联及其集团的瓦解为标志而告结束,但这不等于宣告冷战的结束是美国的胜利;其三,中国的冷战经历与经验,既是国际冷战史研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也曾对中国在自身发展道路上所做出的选择与再选择产生了重大影响。

美国卡特中心和佐治亚帕里米特学院刘亚伟的《毛泽东的美国观及其对中美关系的影响》,首先介绍了沈大伟、杜维明、亨特等美国学者在研究中国人的美国观时所运用的理论,并分析了其存在的偏颇之处。文章描述了毛泽东的美国观由崇尚滑向失望、最后到厌恶和敌视的线性发展过程,并分析了其中的原因:其一,与毛泽东本身的马列主义信仰有关;其二,跟毛本人所拥有的知识、获取信息的途径与客观性、准确性有关;其三,和当时的国际形势有关;其四,与毛本人的脾性也有所关联;其五,和毛本人的美国文化背景储备有关;其六,现代中国的现实和所处的国际环境也是个重要的因素。该文在阐发上述因素时,并结合材料论述了毛泽东的美国观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上海大学李嘉冬的《新城新藏与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讨论了1937年中日全面战争的爆发,对位于上海法租界的日本研究机构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命运变迁的影响。文章通过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所长新城新藏这个独特的案例,希望对理解近代中日文化交流的复杂性提供一定的益处。文章认为,新城在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所实施的政策有其独立科学研究的性质,但是囿于日本对华政策,以“中日提携”作为座右铭的新城无视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行径,将中国民众的抗日爱国运动归咎于“三民主义”的教育。新城单

纯地将孔子之教看成是“中日提携”的基石,把孔学作为救中国的惟一通途,这种缺陷是致命的,也导致了其最终魂落黄土的宿命。

刘亚伟的文章激起了与会者的热烈讨论。朱宗震指出应当注意研究中国人物的范式,并认为研究毛泽东等精英人物,应当学习西方学者善于创造的学术自由精神。此外,还应结合毛泽东所处的时代和文化背景,把毛泽东放在一个宏观的层面进行考察。洪朝辉认为还要注意毛泽东的天朝上国的潜意识和民族主义倾向。汪朝光则建议在研究人物个案时避免片面扩大化的倾向。

5. 近代思想与人物

华东师范大学许纪霖的《大我的消解——唯我式个人主义如何在中国兴起》,论述了唯我式个人主义在中国出现的历史背景、演变流程及成因。该文首先界定了唯我式个人主义的定义,认为这是带有中国传统意义上杨朱式的唯我主义。进而探讨它的历史演变过程和中国传统文化、晚清社会文化背景、五四运动及西方式的个人主义对其成型演变的塑造催化作用。作者最后得出结论,认为在中国思想史上存在着两种个人脉络,即小我与大我、物欲与精神平衡的个人主义和脱离大我约束、从杨朱的唯我式到近代物欲主义的个人主义,且“小我(个人)的价值唯有放在大我的意义框架之中方能实现”。

上海大学陈勇的《钱穆与胡适》一文,以中国现代学术思想史的两位大师的交往事迹、研究路向为写作背景,重点剖析了两者的学术渊源。作者以钱穆眼中的胡适为切入点,分析了不同历史时期两个人的学术关联,描述了钱穆由20世纪二三十年代对胡适的尊崇到40年代的疏离,再到50年代以后的公然批评和指责的落体式过程,认为研究这种转变对20世纪的中国学术史“当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的司昆仑则用人类学理论剖析近代中国家庭。她的《巴金的激流三部曲与家庭史的演化》,以中国现代文学经典人物巴金先生的代表作《激流三部曲》为考察对象,结合学界在家庭史取得的成果,认为该三部曲中所呈现出的家庭变化的景象正是20世纪中国城市生活多元化发展的例证,并解读了父权制在中国的解体过程及20世纪中国城市文化保守主义的理论构架进程。

王先明在点评许纪霖的文章时指出应当从表象深入内层,探求中国所出

现的个人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是消费经济的产物,且这种个人主义是否具有全民性还有待考察。许纪霖在回应时结合西方特色的个人主义,指出个人主义和群体主义是相对应的,它和全球化并不矛盾,且是消费主义全球化的补充。对于有学者提出的自私、自利、个人主义的概念区别的问题,许指出这些在英文中都有相对应的词汇,在理解上结合相对应英文词汇便可一目了然。陈勇在回应钱穆和胡适两人的弟子是否参与了两者的学术争论的问题时,认为应当进一步挖掘相关史料进行考察。在回应钱穆对胡适“全盘西化”的批判所具有的现实意义的问题时,他认为钱穆由先前的主流派人物走向边缘化,因批判主流人物而被反批判,而“全盘西化”则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当时中国士民的文化认同危机。对于司昆仑的研究主题,与会者认为巴金的这部著作只是中国家庭史的一个样本,而不能把其当作全面代表。对于该文阐述的在“五四”时期开始解放奴婢的观点,也有学者认为这种论点有待商榷,因为已有相关材料鲜明地证明了在晚清时已有解放奴婢的言论和行动。

6. 宗教与历史

美国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姚平的文章《西方中国宗教与妇女史研究——介绍与评论》,从道家、佛教、中国神话及民间信仰三个层面,探讨了西方学者对中国妇女形象及性别观的研究著述。对柯素芝编译的《墉城集仙录》、蔡安妮编译的《比丘尼传》、白安妮的《中国神话导论》等著作进行简略概述,并分析了其中的理论趋向。文章最后展望了西方学界的研究方法对中国宗教与妇女研究的理论借鉴作用,认为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其一,应研究宗教在家庭和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影响和其表现形式;其二,系统分析宗教对男性女性所产生的不同影响;其三,应从世界史的角度考察中国历史。

华东师范大学马自毅的文章《1906年的南昌教案》把主体聚焦在南昌县知县江召棠身上,围绕江的死因展开了缜密的论证。她结合江西省内其他教案,认为清朝官员的枉法徇私是酿成重案的主因。这些论断有助于我们反思因帝国主义强权而导致教案丛生的旧有观念,深化对教案背后复杂的社会文化背景的认识。该文在最后认为历史研究“应当是研究者对生命过程的体验、对人性尊严的追求和解读”,不应该简单地把近代中国的命运多舛仅仅归咎于西方列强的入侵,应当在爱国精神的基础上,有更为深刻的思考和反思。

上海大学陶飞亚的文章《药品还是毒品:马克思宗教鸦片论的中国经验》

考释了马克思“宗教鸦片论”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在不同时代的不同人们对其理解的变迁,指出了中国共产党宗教观的思想源头,也勾划出党在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过程中,特别在“文革”之后的改革开放年代,对宗教问题认识由表入里的深化及相应宗教政策的演变。

上海大学杨莉在点评姚平的文章时对具体的学术概念分类提出了质疑,她认为应当合理分类西王母、观音等神学人物形象。姚平在回应时申明该文出于文章编排的角度揭示了某些概念的分类模糊情况,并认为美国对中国宗教尤其是神话中的女性形象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杨莉在点评陶飞亚的文章时提出两个问题:其一是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在学术研究上的变化及这种变化的促进因素;其二是学术研究在政府决策中所起到的作用。陶飞亚认为“文革”中宗教界成为“重灾区”的教训和改革开放以来的思想解放及学术交流都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研究产生影响。至于学术研究对政府决策的影响,具体过程和精确细节不得而知,但相信彼此的互动和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7. 学术中的史学

武汉大学谢贵安的《试论儒学与史学的关系——以儒学对实录体史书编纂的影响为例》以《诗》、《书》、《尚书》等中国传统儒经和《史记》、《明太祖实录》和清朝诸帝实录等实录体史学著述为研究案例,论证了儒学对实录体史书的主题思想、写作内容、编纂笔法上的重要影响。文章认为“实录体史学的主题思想,旨在强化儒家的纲常伦理,突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等观念;以君主为传主的实录体,其体裁的创立和盛行本身就是与以君主为核心的中央集权制的发展相适应。而实录的编纂亦以儒学‘春秋笔法’为指针。实录内容的取向常视儒学观念的变化而变化”。作者在文章的最后以章学诚为个案论述了史学相对独立的个性特征。

上海大学张童心和荣亮的《“西学东渐”与中国近代考古学》一文论述了西方史学潮流对中国近代考古学建立的催化作用。该文首先论述了中国传统金石学的历史发展过程、研究特色及对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启蒙功用,转而把视线移到西方近代考古学思想的传播过程及影响,认为近代中国考古学的建立除了本国学者的努力外,外国探险家、传教士和学者的直接介入,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进而以中国近代考古学大家马衡、董作宾、李济和安阳殷墟为考察对象,论证了中国传统金石学和西方考古学理论在中国近代考古

中国的思想与社会：历史研究的回顾、探索与展望一

学的建立过程中所起的化合作用。

8. 女性与中国历史

上海大学杨莉的《“女官之家”：从边洞玄传看唐代女道观的经济生活》，根据《墉城集仙录》所反映的女道士的经济生活方式及其在社会经济活动的参与，把这个群体划分为纺织自给、修道不食、山居乞食、民众供养以及主持斋醮五种类型。并从经济来源、经济生活方式、经济生活的范围和性质多个侧面考察了唐代女道士与普通民众妇女的异同，认为无论在群体还是在个体范畴上，两者都存在着根本的差异。

美国圣地亚哥大学孙绮的《历史与现实：浅论中国妇女的工作权利变迁》把近百年的中国文化的主题划分为传统文化、毛泽东时代的政治文化和80年代以来逐渐形成的商业文化，在这三个主题下考察中国女性工作权利的变迁。孙认为，研究的关注点不仅是对工作权利的选择，而是应当放在对选择的权利、选择的自主和选择后的机会上。文章得出结论，在实际生活中，传统文化的制约、政治挂帅的经济制度和金钱至上的商业文化都对妇女解放运动的正常发育与发展产生了极其不良的影响。并认为通过行政干预只能从表面上改变妇女的就业率，但无法根本改变妇女在社会制度、文化习惯和思想观念方面的从属地位。

美国佛罗里达大学张泓的《现代化与网路革命：中国女性博客的自我表征》则以女权主义为切入点，结合西方学界的相关研究理论及资讯化时代所带来的媒介表现，以中国网路红人芙蓉姐姐为研究个案，论述了女性博客所表现出的女性主义。张从社会的巨大变化、社会地位阶级的浮动性以及人口的流动性方面解读了资讯网路技术给女性带来了彰显自我的平台，认为女性博客的出现是现代女性主义的表现之一，是对现代社会和社会文化潮流的响应。

美国明尼苏达圣玛丽大学的倪亭认为杨莉的文章的最大贡献就是对非精英人物材料的挖掘，并阐述了这个群体参与宗教活动的作用和影响；但是她同时指出该文在理论上需加强提升，应深入阐述参加宗教活动是否能够真正地提升妇女的权力地位。文章中的一些概念如独居女道士和半独居女道士也应当详明阐发。对于孙绮的文章，倪亭认为在考察时应当注意经济因素的作用，并从一个更大的、即人权问题的视角阐述论点。倪亭认为张泓的文

章应当深入探讨中国标准女性形象的变迁和内涵,并直言芙蓉姐姐等所谓的另类女性也只是在一定范围内的变化,带有某种层面上的保守主义。杨莉回应时补充了独居和半独居女道士的概念,即未婚和离异的女性道士,并认为唐代女道士的概念不太严谨,应当为唐代修行女性。孙绮回应说中国的妇女权利虽和人权有关,但更多的是和民主主义及现代化产生了联系;并从各个具体的历史阶段论述了妇女解放运动不是自发性和草根性的,认为政治手段的作用在其中特别的强烈。张泓认为当今中国社会已经出现多元化的趋势,对理想女性形象的定义较为复杂。从传统的女性标准而言,芙蓉姐姐不符合这种形象,但其也带有某种程度上的保守主义。

9. 社会史视野下的近代中国

南开大学王先明的《乡绅权势消退的历史轨迹——20世纪前期的制度变迁、革命话语与乡绅权力》,把乡绅置于从清末新政到抗日战争结束这个宽泛的历史过程中进行轮廓式考察,思辨性地论证了乡绅阶层与制度变迁和国共两党统治的多重互动影响。该文认为虽然制度的存废在现代中国时有发生,但乡绅阶层凭借着新的制度建构和地方社会资源,仍影响和制约着地方权利的建构和功能的发挥。国共两党对士绅阶层的异同态度及其原因则又是另一论述要点。该文从国共两党的阶级成分、统治运作方式、社会的政治背景分析了士绅阶层在两党内的生存态势。如作者言,该文的主要目的是“深入考察特定的社会结构、传统习惯和地方惯例下的士绅阶层的活动面相,而非仅仅囿于‘制度变迁’的视角,并从不同领域的地方性的生活场景中,抽绎和凝练出超越地方性的具有共趋性的历史特征和认知价值”。

美国加州州立大学长滩分校李国彤的《从跨文化的角度反思反缠足话语的建构》以明清鼎革后的满汉族群、欧美的传教士、英国的改良派、中国的维新派、现代中外学者对妇女缠足的反应及应对为写作主线,并分别定义为族群话语、宗教话语、时尚话语、民族国家话语和学术话语。在此基础上,该文从跨文化的视角比较分析了国外学者对阿尔及利亚妇女的面纱及英国殖民统治下的印度妇女的研究,多侧面地阐述了现代学者对殖民话语的抨击。作者在文章的最后发出呼吁,希望通过对缠足妇女口述史的整理,能够更多地聆听事件主体——中国妇女的声音,把握缠足妇女对反缠足运动的感受,探究自觉投入到这一运动的中国妇女的目的。

上海大学刘长林的《媒体对自杀社会意义的赋予——以中国 1919—1928 年社会运动为例》，以此阶段社会运动中的自杀事件的报道为例，研究了媒体运用何种方式赋予了殉国型自杀的社会意义。该文从媒体服务当时政治需要的观点出发，结合《申报》、《民国日报》的相关自杀案例加以论证，描述了媒体通过纸媒介版面设计的多样性、运用富有感染性的修辞手段、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爱国思想资源等模式，在故事叙述模式、话语结构与策略上突出了自杀行动与爱国运动目标的一致之处。认为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公众对国家共同价值和民族危机的认同，以便动员民众、共同御侮，直到抗战胜利”。

卢汉超在点评王先明的文章时指出应当再把研究的时间界限后延到 1949 年后，并对文中革命话语较为浓厚提出了质疑。王先明在回应时谈到该文的研究范围虽立足于华北，但也有所外展，如果展开全国性的或时间跨度较大的研究则过于庞大，不便于把握。而该文界定的时间段正是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最为严重的时期，不结合革命的话语背景，是行不通的。陶飞亚就李国彤的文章发表些许建议，认为注意不同的时代和区域的不同特点，加强个案的、微观的分析，如更多的比较研究中国南北方的妇女缠足的差异、不同政权统治下如国民党、共产党和日伪占领区所实施的不同政策、城市和农村女性缠足的异同。魏楚雄则认为应加强从男性的角度研究中国妇女史，微观考察家庭对妇女思想的影响。针对刘长林的文章，卢汉超在点评该文时提出应当注意“五四”时期出现诸多自杀现象中的日本因素，此外，对是否出现女性自杀的案例提出了疑问。刘长林在回应上述问题时，认为“五四”自杀现象中的日本因素还有待挖掘材料证明，而其文中把贞女视为一种符号资源，其实就是某种层面上的批判。

10. 民主与政治认同

美国马塞诸塞州州立大学波士顿分校叶维丽的《“1936 年班”：中国革命历史研究中被遗落的一代》，研究了抗战爆发前后中国一代城市知识青年。该文认为对该群体研究的薄弱，是被“历史学家忽略的一代人”，根据跟踪调查和档案史料，认为这一群体在现代中国乃至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领域发挥了导航和助推作用，进而提出在“现代化范式”成为主流范式时，学界应当重回“中国革命”研究。